

俄罗斯联邦民族-国家建设与分离主义的消弭*

孙超 钮维敢**

【内容提要】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在民族-国家建设中成效显著，不仅极大地提升了国家能力，而且解决国内分离问题，避免了国家失败和政治衰朽。俄罗斯境内分离主义的消弭，在于其领袖选择了成熟的民族-国家政策和策略。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国家精英克服国家分裂的风险，建立起总统制和不对称联邦制，但面临着地区分立主义和车臣分离主义问题。历经两次车臣分离冲突之后，普京总统进行联邦制改革，把权力集中到了联邦中央；通过大国外交构建了俄罗斯现代认同；通过八月战争强化了俄罗斯政权的强力性。此后，通过干预乌克兰危机，极大提升了俄罗斯政权的民族性特质，再次巩固了俄罗斯民族-国家建设的成果。普京四任预示着其保守主义政策理念的延续，俄罗斯民族-国家强力建设的步伐不会停顿，但也意味着俄罗斯的民族-国家建设面临新一轮的挑战。

【关键词】俄罗斯民族-国家政策 俄罗斯联邦制 俄罗斯分离主义

【中图分类号】D751.2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8)03-0131
(38)

* 本文系2016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冷战后资本主义阵营衍化及其影响研究”（项目批准号：16BKS073）及2017年江苏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一带一路’战略中的‘四个伟大’研究”（项目批准号：17DDA002）的研究成果。感谢冯绍雷教授、陈大维老师及匿名审稿人对于本文提出的重要修改意见。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曾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左希迎、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阎德学老师，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封帅、上海政法学院博士后韩冬涛等师友进入过深入的交流讨论，谨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 孙超，江苏省委党校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讲师；钮维敢，北京建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江苏省委党校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教授。

一、引论

苏联解体是一个复杂的进程，与之相伴随的是新国家的建立。与亚洲和非洲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不同在于，它不仅导致旧有统治模式的崩溃，更造成了社会经济和文化结构的剧变。国家的本质、角色甚至是能力，成为剧变的核心议程。^①一方面是“帝国的崩溃”，原有的制度、意识形态和规则形成的体系崩塌，依靠苏联共产党维系的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不复存在。^②另一方面，围绕领土的争夺日益加剧，新的概念诸如“民族主义”、“领土完整”、“独立国家”、“分离主义”迅速取代苏联学的核心概念，成为解释后共产主义国家建设的新的理论工具。^③随之出现的欧亚地区的分离主义，是民族、地区、领土或者社会自决的极端形式，其产生与民族或区域身份意识的觉醒相关，更与四类政治危机——身份危机，分配危机，合法性危机和参与危机——紧密相连。土地，及其所附着的祖国、领土、疆域等理念，成为各类共同体的想象和寄托。土地成为群体认同的隐性要素，是诸多民族构建的家园。^④一些族群宣布使用民族自决原则，脱离苏联独立，迫切地希望使族群与“领土”保持一致。

俄罗斯联邦深受其害。自1991年俄罗斯实现经济和政治转型以来，俄罗斯联邦并没有改变原苏联国家联邦体制的政治原则——族群联邦制，成为一个拥有1.48亿人口和180个族群的庞大国家。独立后的俄罗斯联邦由32个民族自治实体和57个地方自治实体组成，32个民族自治实体包括21个民族共和国、1个民族自治州、10个民族自治区。^⑤此时的俄罗斯，不仅面临着一些自治地区的分离问题，同时也亟待处理苏联时代遗留下来的族群矛盾，其内部潜藏着严重的分裂危机。这不仅因为独立的俄罗斯国家能力脆弱，

① Vicken Cheterian, *War and Peace in the Caucasus: Russia's troubled frontier*, London: Hurst Company, 2008, p.7.

② Dominic Lieven, *Empire: The Russian Empire and Its Rivals*,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289-292.

③ Vicken Cheterian, *War and Peace in the Caucasus: Russia's troubled frontier*, p.7.

④ Monica Duffy Toft, *The Geography of Ethnic Viole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1-2.

⑤ 邱显平：“变迁中的俄罗斯联邦体制与民族问题”，《俄罗斯研究》，2005年第3期，第21页。

无法使用强力手段解决国家分裂危机，还因为俄罗斯联邦制是“预先存在的、没有共识的族群—区域联邦制度”。^①叶利钦为了求得竞选总统的胜利，尝试从联邦内部获得更多的支持者，对各政治单位，特别是民族自治共和国，承诺“只要有能力承担，尽可能拿走主权”（take as much sovereignty as you can swallow）。^②自1992年到2001年，各联邦主体同联邦中央签署了42份双边条约、200多份双边文件。自治共和国从俄联邦中央获得承认，不仅控制了地方经济资产，同样增强了主体民族在民族自治体中的特权地位。^③自治的政治地位一旦与极端族群民族主义诉求相结合，就会构成对俄罗斯联邦统一的威胁。自治共和国大多会利用分离策略同联邦中央讨价还价，以获得更多的权力和财富。一些民族实体将俄罗斯联邦视为剥削者和竞争者，在自治地位受到威胁时进行分离，以保障原有的权力和财富。^④正如科内尔（Svante E. Cornell）所说，自治是冲突的来源，而不是和平的手段。^⑤有学者认为，俄罗斯将会如苏联一样再次分裂下去，愈演愈烈的车臣分离主义是俄罗斯国家分裂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开始。^⑥

俄罗斯民族国家构建的问题较为复杂。一种基本观点认为，应从民族国家建构的西方模式出发，以联邦制、选举民主和意识形态排他性为基础来建构国家。这显然不符合俄罗斯长期以来的历史传统和国家发展逻辑。90年代的叶利钦时期的央-地关系已经给出了答案。而另一种基本观点则强调多元的现代性，认为应从集权模式出发，通过危机解决的路径，调整联邦中央与联邦主体之间的权力互动模式。^⑦显然，俄罗斯的国家构建正在创造这一种多元性。西方学者对俄罗斯联邦生存的探讨，主要以联邦中央克服联邦主

① Alfred Stepan, “Russian Federalism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ost-Soviet Affairs*, 2000, Vol.16, No.2, p.139.

② Alexei Malashenko, “Islam, the Way we see it”,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2006, Vol.4, No.4, p.29.

③ Louk Hagendoorn, Edwin Poppe & Anca Minescu, “Support for Separatism in Ethnic Republic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Europe-Asia Studies*, 2008, Vol.60, No.3, p.354.

④ Ibid, p.369.

⑤ Svante E.Cornell, “Autonomy as a source of Conflict: Caucasian Conflict in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World Politics*, 2002, Vol.54, No.2, pp.245-276.

⑥ Henry E. Hale, “The Makeup and Breakup of Ethnofederal States: Why Russia Survives where the USSR Fell”, *Perspective on Politics*, 2005, Vol.3, No.1, p.55.

⑦ 感谢冯绍雷教授就“俄罗斯国家构建模式”主题提供的意见与建议。

体的分离倾向为起点，探讨俄罗斯联邦持续生存的逻辑。西方学者对俄罗斯联邦分离风险的评估，多是从中央弱势、族群-联邦的制度缺陷和族群冲突入手，认为俄罗斯联邦难以存续。同样也有学者认为，俄罗斯能够作为一个“国家”生存下来。从版图上看，当前俄罗斯境内 85%的人口都是俄罗斯人，21 个自治共和国中只有 5 个少数民族占据优势，少数民族犹如处在俄罗斯民族汪洋大海中的孤岛，难以聚合，缺少分离的前提。^①一些学者将俄罗斯与苏联进行对比，指出俄罗斯在客观条件上基本上不具备发生大规模分离冲突的可能性，在自由民主制基础上形成的联邦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一种理想的国家聚合类型（holding together），不会形成安全困境，也不会引发族群叛乱和冲突。^②

尽管俄罗斯保留了族群-联邦制的政治框架，但联邦内部的框架较之苏联时期更为碎片化，多数自治共和国没有独立建国的历史，难以利用有限的资源和传统进行分离。^③从经济上看，从苏联独立出来后，各联邦主体与俄罗斯联邦中央签订协议，在经济上获得优惠和好处，分离动力也就缺少了支撑。分离决心的形成需要宿怨的日常积累，俄罗斯各联邦主体与联邦中央建立了去意识形态化的政治联系，各单元的自治水平增强，进一步削弱了联邦单元进行分离抗争的心理基础。^④俄罗斯族群的人口众多，分布广泛，联邦在建国初期的“权力去中心化”措施，加强了中央与自治地方之间的“网状

① Gail W. Lapidus, “Asymmetrical Federalism and State Breakdown in Russia”, *Post-Soviet Affairs*, 1999, Vol.15, No.1, pp.74-75.

② 斯泰潘（Alfred Stepan）认为，所有的联邦制度都是通过次国家单位进行政治交易（political bargain）实现的。在他看来，存在三种聚合形式的联邦主义：“自下而上”的（coming together）联邦制，即面对内外威胁，联邦成员自觉组成一个政府，如美国；自上而下的（holding together）联邦制，在形成联邦制之前国家是单一制结构，中央处于绝对主导地位，出于多民族分裂风险，考虑采取此制度，如西班牙和印度；最后一种是胁迫性的（putting together）联邦制，其代表是苏联，大多数联邦成员来自于苏联政治控制和军事占领。按照斯泰潘的逻辑，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变成了自上而下的（holding together）联邦制，尽管中央与地方签订了多个双边协议，但俄罗斯联邦依然拥有主导权。具体参见 Alfred Stepan, “Russian Federalism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p.141-145.

③ Ibid.

④ Stephen H. Hanson, “Ideology, Interests, and Identity: Comparing Secession Crises in the USSR and Russia”, Ponars Working Paper, November 1, 1998, <https://www.csis.org/analysis/ponars-working-paper-010-ideology-interests-and-identity>

联系”，提升了原自治地区政治地位，削弱了这些地区潜在的分离动力。^①

上述观点差不多有效论证了俄罗斯在建国初期为什么能够保持稳定和统一，所给的论据大多基于叶利钦时期的“去中心化”政策和国家形成初期政治精英的妥协。这些观点希望论证的是：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国家建设，无疑是促成俄罗斯国家稳定和消弭分裂力量的根源。尽管如此，仅从静态角度分析，仍然难以解释为什么车臣分离主义到 21 世纪初期还依然存在，直到普京时期才得以彻底解决。而且俄罗斯联邦也不是斯泰潘所说的那种“自上而下”的联邦制结构，而是各联邦单元在路径依赖前提下的“自然聚合结构”（staying together）。^②当前的著作中虽然关注到“强力”（force）对联邦制和俄罗斯国家构建的作用，却没有特别关注到“国家性”（stateness）问题。^③在俄罗斯国家建设过程中，俄罗斯联邦的国家性在不断增强，联邦成员的自治水平也逐渐被压缩，为什么“失去高度自治”的联邦成员没有出现分离主义？分离势力为什么在政治斗争失败后以恐怖主义面目出现，却并未影响和改变俄罗斯的国家安全战略？在分离势力消弭后，俄罗斯民族—国家建设如何铺展开来以构建多民族的国家认同？仅从族群关系和联邦体制等角度无法分析分离主义在俄罗斯的消弭，也无法客观评价不同时期的俄罗斯国家建设方略。

由于现有研究成果集中在从联邦主义和族群冲突角度探讨俄分离主义的消弭，这就造成研究中存在俄罗斯国家主体缺失的问题。我们难以从这些观点中把握俄罗斯国家在消弭分裂势力中发挥的作用，也难以明确俄罗斯在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的障碍。本文将从俄罗斯民族—国家政策入手，分析俄罗斯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演变过程，尝试探讨俄联邦分离主义消弭和俄罗斯迅速建成强力国家的深层原因。

在提出本文的分析框架之前，需要对民族国家政策概念进行界定。所谓

① Henry E. Hale, “The Makeup and Breakup of Ethnofederal States: Why Russia Survives where the USSR Fell”, pp.56-63.

② Brian D. Taylor, *State Building in Putin's Russia: Policing and Coercion after Commun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119.

③ Brian D. Taylor, “Force and Federalism: Controlling Coercion in Federal Hybrid Regimes”, *Comparative Politics*, 2007, Vol.39, No.4, pp.421-440; Michael Thumann, “Between Appeasement and Coercion: Russian's Center-Periphery Relations from Yeltsin to Putin”, *Demokratizatsiya*, 2001, Vol.9, No.2, pp.193-200.

“民族国家政策”，最早由布鲁贝克（Rogers Brubaker）提出，是指国家领导人有意无意地发出一种信息或政策，即将国家（state）视为未实现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国家应当是民族的以及为了特定民族的民族国家（the state of and for a particular nation）。^①在本文看来，民族国家政策指的是新国家的个体生存策略，通过协调国家建设（state-building）和民族建设（nation-building）的关系，以促进国家的稳定和发展。苏联加盟共和国变为独立国家，所有国家都是以“主体民族”为基础，实施布鲁贝克称之为“民族-国家”的政策。在进行公开的政治竞争时，政治精英们大多提出极端民族主义纲领，并以此作为国家的生存基础。但在转型过程中，一些多民族国家差不多都放弃了这种极端化的民族-国家政策，追求多民族国家的共存和秩序，并采取多种方式解决族群矛盾和分离问题。本文提出一个民族国家政策演变类型的框架，以俄罗斯应对内外挑战，特别是两次车臣分离冲突以及对外干预分离问题作为案例进行分析，阐述联邦中央如何在维持族群联邦制的前提下消弭分离主义，逐渐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并实现巩固。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探讨后苏联空间普遍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政策的演变类型；第三、第四部分探讨俄罗斯国家精英在两次车臣战争中所面临的挑战以及政策选择；第五部分以达吉斯坦作为案例，探索为什么条件类似的达吉斯坦并未出现大规模分离风险；第六部分则探讨俄罗斯民族-国家建设的对外向度，最后一部分进行讨论与总结。

二、民族国家政策演变类型

后苏联空间 15 个独立国家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他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们距离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定义的现代国家有多远。许多政治思想家和行动者都假定，韦伯意义上的国家、民族-国家以及民主，构成了现代政治体的基本规则。^②在韦伯看来，国家是一种统治团体，是对

① 详细参见 Rogers Brubaker, *Nationalism Reframed: Nationhood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the New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63-66.

② [美]胡安·林茨、阿尔弗雷德·斯泰潘：《民主转型与巩固问题：南欧、南美与后共产主义的欧洲》，孙龙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5页。

可以标明的地理区域内、对强力的合法性实施垄断以贯彻其制度。^①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继承了韦伯对国家的定义，将其解释为“占有确定区域并控制区域内人口的组织”。^②蒂利注意到了现代国家成功的关键在对领土内人口的控制，对暴力的垄断成为现代国家构建的核心内容。^③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抽离出现代国家内涵，将政府的有效程度作为区别国家最重要的指标，其实质依然符合韦伯意义上的现代国家逻辑。^④构建现代国家是民族国家政策的核心内容，也是后苏联国家实现政治秩序、促成政体稳定的有效手段。

问题在于，苏联解体之后，在不同地区存在着具有类国家特征（statelike）的组织和政权。一些政权宣称在其“国家领土”范围内实施暴力的合法性垄断。在后苏联空间地区，这些类国家组织最突出的代表是族群共同体。一些族群精英密切观察着新成立国家的民族国家政策，并对带有任何标识的“民族—国家化”项目非常敏感，甚至不愿意新兴国家在本土实现暴力垄断。^⑤对新兴国家来说，恢复在领土内的最高主权，解决族群分离主义问题，是国家必须要完成的工程。因此，分离问题是国家必须要处理的棘手问题。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即现代国家对分离主义带来的“示范效应”深感忧惧。^⑥分离主义不仅塑造使现代国家忧惧的敌人，还影响国家合法性的维持。分离主义的肆虐，不仅容易引起政权的崩溃，更影响到地区政治和国际政治。^⑦分离共同体的出现极大地影响了国家自主性的发挥，对国家生存是个挑战。正因为如此，国家会集中精力应对分离问题。中央默许分离共同体分离致使分

① [德]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中译本）上卷，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84页。

② Tilly Charles,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p.70

③ Peter Halden, *New Agendas in Statebuilding: Hybridity, contingency and history*, London and NY: Routledge, 2013, p.4.

④ [美] 萨缪尔·亨廷顿著，《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页。

⑤ Rogers Brubaker, *Nationalism Reframed: Nationhood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the New Europe*, p.58.

⑥ Donald L. Horowitz, *Ethnic Groups in Conflict*,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p.266.

⑦ 包刚升：《民主崩溃的政治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26-27页。

离成功的路径，在欧亚地区没有经验支持。^①

国际社会承认苏联 15 个加盟共和国为新的主权国家，这些国家也就成为具备现代国家特征的组织。从外在条件看，国家可以建立组织和规则，使用一致性作为其存在的前提，但国家的生存还需要民族的支持。韦伯将民族视为价值的范畴，认为民族首先并非与国民保持一致。^②一个国家不一定由一个民族组成，而一个民族可以在不同的政治体中生存。随着 18 世纪末民族主义的兴起，国家与民族成为现代政治共同体的一体两面。民族主义成为国家存在的合法性源头。而如果没有国家的控制，民族要采取的行为不能被认为是合法的 (legally)，甚至不能被认为是正当的 (legitimately)。^③任何外国势力如果想要这个国家出现危机，只要挑起其境内的文化、语言、宗教、族群和地区认同问题就可以了。^④民族成为国家的内在补充，维系国家的生存和价值，将国家塑造成为可供民族繁荣发展的家园。后苏联空间各国基本上以主体民族作为内在机理构造现代国家，有力地说明了民族是推动后苏联空间国家存续的基础和要件。

对分离势力而言，国家权力专制性和渗透性特征被视为一种外在强力和压迫。在波森 (Barry Posen) 看来，“帝国的崩溃可以被视为一个突现的无政府状态”。^⑤苏联解体无疑创造了这种无政府状态，欧亚 15 个民族国家大多都是基于主体民族构建而成的。在这个前提下，如果中央政权被某个族群占有或者支配，并转变为一个实际上的内部精英集团，而其他族群不得不完全依靠自助来维持自身安全时，“安全困境”就会产生。^⑥在这种前提下，

① 国家在原则上不会与分离共同体达成妥协，20 世纪鲜有案例表明国家支持分离共同体进行和平分离。参见 Robert Young, “How do peaceful secessions happen”,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994, Vol.24, No.4, pp.773-792; Henry E. Hale, *The Foundation of Ethnic Politic: Separatism of states and Nations in Eurasia and the world*, p.66.

② [德]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中译本）下卷，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年，第 241 页。

③ [美] 胡安·林茨、阿尔弗雷德·斯泰潘：《民主转型与巩固问题：南欧、南美与后共产主义的欧洲》，孙龙等译，第 22 页。

④ Harris Mylonas, *The Politics of Nation-Building, Making Co-Nationals, Refugees, and Minorities*, p.17.

⑤ Barry Posen, “Security Dilemma and Ethnic Conflict”, *Survival*, 1993, Vol.35, No.1, p.27.

⑥ 唐世平：“安全困境和族群冲突——迈向一个动态和整合的族群冲突理论”，《欧洲研究》，2014 年第 3 期，第 40 页。

国家精英强力实施民族整合或一体化政策,就会被认为将危及少数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反过来,少数民族寻求自主性,对主体民族采取进攻性或敌意性的自助行为,则会被视为脱离国家的分裂行为。^①

正是这种安全困境的存在,导致欧亚地区国家精英在制定民族国家政策过程中需要考虑国族建设^②的策略和方法,以防止安全困境的形成和分离力量的壮大。尽管政治共同体需要采取多种方式来加强国家的整体性,确立国族的同质性,强化国民身份,但也要看到,这个过程很容易变成民族化国家的过程,即单一民族主导整个现代民族构建过程。民族国家政策必须围绕国族的同质性与维护非主体民族的族属身份和权益的关系展开。^③如果主体民族采取挑衅性的民族构建政策,强力同化或是排斥少数民族,后者很有可能为了寻求更大的自治或独立而与母国爆发冲突,衍生分离问题,影响现代国家建设进程。

新民族国家自建立之日起,需要经历多个阶段才能达到较为理想的状态。这些阶段可以概括为新兴国家从脆弱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过程。“主体民族”国家精英在接手国家之后,往往要进行国家建设或民族建设。由于路径依赖,各精英面临的困境和选择不同,对民族国家的政策选择也不同。对新兴的多民族国家而言,国家建设往往优先于民族建设,获得权力优先于获得认同。而当政权得到巩固之后,国家精英会改变民族国家策略,转

① 王凯、唐世平:“安全困境和族群冲突—基于‘机制+因素’的分析框架”,《国际政治科学》,2013年第3期,第13-21页;Shiping Tang,“The Security Dilemma: A Conceptual Analysis”,*Security Studies*,2009,Vol.18, No.3, pp.587-623.

② 本文认为,后苏联空间尤其需要区分国族、民族和族群三个概念。国族与国家密切相关,是民族-国家构建的产物,被视为国家认同的核心。民族(nation)则是指拥有独立政治意识的共同体,在历史上曾经对自己宣称的领土和人口享有主权和管辖权,而族群(ethnic groups)也是拥有独立意识的血缘共同体,是否具备独立管辖权并不是判断族群特征的关键。在苏联时代,斯大林创造性解释了“民族”的概念,“民族”明显带有政治意味,与当时苏联对各民族在政治体制方面的安排(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自治州)相吻合。同时斯大林淡化了文化和心理因素在民族中的作用。他认为列宁的“民族自决权”针对的是民族——乌克兰人、格鲁吉亚人,而不是族群——乌赛梯人、犹太人、日耳曼人和吉普赛人。后苏联空间延续苏联时期的政治遗产,主体民族成为建设国族的主要力量,而族群是被团结的对象。一些族群的政治意识得以释放,成为后苏联空间影响国家稳定的重要力量。

③ 周平:“民族国家和国族建设”,《政治学研究》,2010年第3期,第94页。

向两个维度：追求国家领土一致的强力国家；释放民族情绪，获得更多合法性以巩固政权。两种维度都有其合理性，一个注重对各族群和领土的控制，一个注重合法性的积累和政权的巩固。这两条路径最终都是指向现代民族国家。在新国家成长过程中，国家精英通常制定民族国家政策以确定国家治理方略的走向，带动国家类型的变化。不同的国家类型对分离主义的产生和演变有不同的效果（参见下表）。

表 1 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国家政策与分离主义关系

多民族国家特征	“主体民族”国家领导人的民族国家政策与行为			
	以民族-国家为目标	允许民族之间的区别和文化差异，但不允许任何形式的分离	精心设计“不对称联邦制”或进行民族自治实践 ^①	原则上通过和平、民主和第三方干预的方式解决分离问题
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未觉醒	容易建立起民族-国家			
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觉醒，但没有分离倾向	有冲突，但民族-国家也有可能建立起来	可以建立民族-国家，但有向右边转变压力	联邦制的民族-国家容易建立	
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觉醒且存在分离倾向	暴力冲突频发，国家难以在境内实现暴力合法性垄断	民族矛盾累积，分离冲突容易转化为暴力对抗；也有可能转变为联邦制结构化解分离危机	民族-国家可建立，但政权面临分离风险，有柔性分离的可能性；如果存在分离冲突，可能向左右边转变	实现“和平分离”可能性很大；但若已爆发分离冲突，可能僵持成冷冲突（frozen conflict） ^②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① 斯泰潘（Alfred Stepan）和利普哈特（Arend Lijphart）等人认为联邦制可以管控族群冲突，减少族群分离主义的发生。Mohammad-Said Darviche and William Gemeys, *Multinational State-Building: Considering and Continuing the Work of Juan Linz*, Montpellier: Pôle Sud, 2008, pp.7-26; Arend Lijphart, *Democracies in Plural Societies: A Comparative Exploration*,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7; Arend Lijphart, *Democracies: Patterns of Majoritarian and Consensus Government in 21 Countrie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② 冷冲突（frozen conflict）是指在武装对抗停止后，冲突双方既没有签订和平协议，也未达成政治妥协，有随时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的情境。

本文认为，国家成立初期的民族国家政策对现代国家的构建非常关键。如果新国家的国家精英在转型初期就以民族-国家为目标，不允许任何形式的分离，会使已存在的族群矛盾放大，造成更大的分离冲突，影响分离问题的解决；而联邦制的设计以及妥善解决分离问题，则给国家精英留下更多的行动余地，更容易促使脆弱国家向维持现状国家转变。俄罗斯联邦在叶利钦、普京等人领导下从脆弱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过程中就成功地跨越了国家分离危机，建立起稳固统一的政治秩序，分离势力逐渐消弭。

本文试以两次车臣分离冲突作为主要案例，并结合消极案例达吉斯坦，以及 2008 年以后俄罗斯民族国家建设的对外战略，探索为什么俄罗斯能够在建国之后短期内迅速消弭分离主义；在解决分离问题之后，俄罗斯为什么又能巩固民族国家建设的成果，并不惧内部潜在的分离风险去干预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分离冲突，完成了对克里米亚的合并。在本文看来，俄国家精英民族国家的政策选择及分离精英无法创设有利于分离的政治社会情势是重要因素，而前者是决定性因素。作为多民族国家的领袖，叶利钦和普京在不同时期所采取的不同民族国家建设策略，对俄罗斯民族国家现代性的形成影响甚大。

三、第一次车臣战争：母体弱势的极端恶果

自戈尔巴乔夫时代开始，民族精英利用苏联权力去中心化的机会，谋求对本区域的控制。与俄罗斯一道，鞑靼、巴什基尔、车臣和印古什等民族，运用民族自决权，动员民众进行抗争，脱离苏联以求自立。苏联解体之际，俄罗斯国家边界尚未厘清。1991 年 8 月，俄罗斯还没有主权边界，没有国家货币，没有国家军队，只有虚弱且定义不清的国家体制。^①一方面，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与其他民族自治体一样作为苏联地方政治单位存在，与其他行为体合作、结盟，一致对抗苏联中央政权，要求独立；另一方面，由于超大的领土面积、人口以及内部的族群及文化的多样性，俄罗

^① [美]迈克尔·麦克福尔著：《俄罗斯未竟的革命：从戈尔巴乔夫到普京的政治变迁》，唐贤兴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 135 页。

斯联邦极有可能就是未来的“苏联”。^①因此，俄罗斯精英对苏联的抗争带有双重性：既是为了弱化中央，与各民族自治体一道获得更多的权力，又是为了控制中央，抢夺苏联的政治和军事资源。^②这种双重性特征使俄罗斯精英在新国家构建中困难重重。从街头抗争中获得支持的叶利钦很快获得国际社会承认，但难以得到俄联邦内部成员的支持。与之相反，在苏联晚期，一些自治共和国加强了对资源的控制，否定联邦法案，停止向联邦纳税，并抵制联邦的选举活动。^③在俄罗斯 1990 年发表主权宣言以后，卡累利阿、雅库特（萨哈）、科米、巴什基尔、图瓦、卡尔梅克和楚瓦什等民族共和国随后发表主权宣言，强调本共和国的宪法高于俄罗斯宪法，明确表示有权退出联邦。^④一些民族自治体还停止向俄罗斯联邦交纳税款。^⑤鞑靼自治共和国和车臣共和国的分离倾向最强。^⑥

（一）民族分离主义的兴起

“八·一九”事件后，苏联迅速崩溃。由于从苏联到俄罗斯转换异常突然，借助民族主义理念上台的俄罗斯国家精英面临着民族自治体分离主义的挑战。族际碰撞并未由于苏联解体而消散，相反，许多族际紧张关系演变成族际冲突。^⑦与东欧国家不同，俄罗斯联邦成立时，并没有对联邦中央和各单元之间的关系重新划定，且依旧承认各族群的自治地位。帝国崩溃导致的“无政府状态”，使得俄罗斯联邦在建立之初异常脆弱，国家精英一直担

① Rogers Brubaker, “Nationhood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Post-Soviet Union: An Institutionalist Account”, *Theory and Society*, 1994, Vol.23, No.1, pp.61-62.

② Ibid.

③ Elise Giuliano, “Secessionism from the Bottom up: Democratization, Nationalism and Local Accountability in the Russian Transition”, *World Politics*, 2006, Vol.58, No.2, p.276.

④ 袁新华：“转型以来俄罗斯联邦的民族问题”，《世界民族》，2004年第5期，第12页。

⑤ Бляхман Леонид Соломонович. Региональные и макрорегиональные основы новой индустриализации// Проблемы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экономики. 2014. 02. С.7-18.

⑥ 邱显平：“俄罗斯联邦权力结构改革与民族问题”，《世界民族》，2006年第1期，第24页。

⑦ [俄]瓦列里·季什科夫：《苏联及其解体后的族性、民族主义及冲突——炽热的头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03页。

忧联邦也可能如苏联一样解体。安全困境在俄罗斯民族自治体普遍存在，一些弱小的主体民族，如阿迪格（Adygeya）和北奥塞梯，都在实施族群排斥政策。^①已存在的 21 个民族单元中，有多个民族单元自行宣布为主权共和国，走自己的道路。一些民族精英牢牢控制政权，地方政府并不听从中央，克里姆林宫的政令难出莫斯科。

对俄罗斯国家精英来说，当务之急是迅速制定和实施民族-国家政策，保证政权的生存。叶利钦在国家草创时期坚定支持联邦主权论，但为了维持政权和国家生存，不得不采取妥协政策。1992 年到 1993 年间，为了能够成功竞选总统，叶利钦许诺各联邦主体“尽可能地多拿走主权”。另外，对经济改革的关注以及对有序改革的信仰，也使叶利钦无暇将精力放在政治体制构建上。为了给经济改革创造条件，叶利钦团队强化行政权，构建新的行政权威，设立新的职位（如总统代表）和机构，在州与地方创建新的职务——以行政长官取代苏联时期的执行委员会主席。尽管叶利钦在不断巩固和加强联邦中央的权力，但叶利钦并没有采取强制性手段维护联邦中央的至高权威，相反，联邦中央承认并尊重联邦主体中把持地方政权的苏联时期官员。这些官员在苏联晚期获得了更多的权力和经济影响力，尊崇苏联时代的价值观，倡导权力“族群化”。^②而创建新的行政体制的目的，也是为了平衡立法机关的权力。1992 年，除了车臣和鞑靼斯坦，构成俄罗斯联邦的 86 个主体签署了《俄罗斯联邦条约》。叶利钦初步设定了国家构建的基本框架。在俄罗斯这样脆弱的国家，叶利钦的第一要务是执掌政权，与议会争夺权力。总统与议会之间的分歧反映的是制度转型时期精英之间的路线斗争。相反，政治权力在各个集团的精英之间不断地转手，或者在政治跟商业集团之间转手，使得动荡和不稳定成为俄罗斯 90 年代前半期的一种常态。^③

① Tomila Lankina, “Local Administration and Ethno-social Consensus in Russia”, *Europe-Asia Studies*, 2002, Vol.54, No.7, p.1037.

② James Huges and Gwendolyn Sasse, *Ethnicity and Territory in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Regions in Conflict*, London and Portland: Frank Cass & Co. Ltd, 2002, p.43.

③ 冯绍雷：“俄罗斯体制转型的路径依赖——从制度变迁和对外关系相关性视角的一种考察”，《俄罗斯研究》，2010 年第 6 期，第 11 页。

（二）不对称联邦制与统一决心的形成

联邦高层权力精英之间的相互斗争带来秩序动荡，最终酿成俄罗斯宪法危机。议会与地方的结盟不仅再次引起俄罗斯国内的紧张气氛，更加剧了国家崩溃的风险。车臣和鞑靼斯坦分离运动的发展，加速了俄罗斯其他民族自治体分离主义的发酵。俄罗斯国家精英普遍担忧俄罗斯可能会因为分离主义而再次崩溃，这也是叶利钦所代表的民主派所不愿意看到的。^①议会与总统之间矛盾公开化了。1993年9月21日，叶利钦发布1400号总统令，要求解散人民代表大会，并走上了与议会对抗的道路。1993年10月，叶利钦命令军队占领象征议会权力的白宫，尽管武装力量不愿意涉入争端，最终还是控制了议会大楼。十月事件标志着总统权力的强化，俄罗斯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随着十月事件的爆发而走向了另一个方向。十月事件标志着俄罗斯解决了国家精英内部的理念分歧，新政权得以巩固。

按照普热沃斯基（Adam Przeworski）的理论，在民主制度中，任何竞争中的政治力量都无法知道冲突的结果，行动者的行动充满变数，不可预期。^②在相对多元主义的影响下，强力部门担忧受到“镇压”的指责，并不情愿对社会进行控制，甚或是卷入政治危机之中。^③因此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俄罗斯联邦处于脆弱状态，国家对社会的权力渗透很弱，政体安全难以获得国家强力集团和外围政治组织的支持。但十月事件之后，俄罗斯转型的轨道发生变化，超级总统制政体的建立从可能变为现实。俄罗斯尽管国力仍处于弱势，但联邦中央已有能力构建秩序，并保证经济-社会改革的进行。为了保证俄罗斯联邦宪法的顺利实施，叶利钦与地方首脑进行多次交易，确保他们的支持。叶利钦希望能够通过多次“讨价还价”（bargain）——即给地方更多的财政补贴和政治自治权，发展出一种能够有效聚合联邦成员、阻

① Gail W. Lapidus, “Asymmetrical Federalism and State Breakdown in Russia”, *Post-Soviet Affairs*, 1999, Vol.15, No.1, pp.74-75.

② [美]亚当·普沃斯基：《民主与市场——东欧与拉丁美洲的政治经济改革》，包雅钧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页。

③ Steven Levitsky and Lucan A. Way,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Hybrid Regimes After the Cold W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192.

止民族自治体和共和国分离的模式。^①这种模式能够满足各地区的多样性，鼓励地区之间相互竞争，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可能会得以减少甚至消除。^②为了调解联邦中央与某些联邦主体之间的矛盾，俄联邦中央采取灵活政策，先后同鞑靼斯坦、巴什科尔托斯坦（即巴什基尔）、萨哈（雅库特）、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北奥塞梯和车臣等 40 多个联邦主体签订了双边条约。^③叶利钦总统甚至希望通过双边条约的讨价还价模式，解决联邦中央与地方民族自治体之间的矛盾，即将“宪法联邦”转变为“条约联邦”，解决国内的分离主义隐患，实现联邦的政权稳定。随着联邦制的建立，俄罗斯并行实施分权化和维持国家稳定与统一的政策。

虽然这种分权化政策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联邦中央与民族自治体之间的矛盾，并对车臣分离主义引起的示范效应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但通过“讨价还价”建立起来的不对称联邦主义（Asymmetrical Federalism）有很大缺陷。叶利钦与鞑靼斯坦通过 12 个政府间协议确立下来的《双边条约》，将鞑靼斯坦确定为与俄罗斯平等的“国际法主体”——主权国家；鞑靼虽是俄罗斯联邦的一个地区，但却可以独立参与国际活动，编制预决算，征收税收，鞑靼斯坦境内所有的资产归鞑靼所有和支配，鞑靼最高法院有权大赦犯人等。^④这种联邦中央和地方确立起来的“鞑靼模式”加剧了联邦主体积极背离宪法和法律的动机，以便达到以独立为要挟手段享受特殊待遇的目的。^⑤通过条约互动，联邦主体逐渐被划分为两种类型：处于一般地位的 57 个州和边疆区，与联邦中央争夺更多的经济和政治资源；享有自治优势的 21 个共和国和 11 个自治区，更为加强内部的族群构建，以主权为中心塑

① Michael Thumann, “Between Appeasement and Coercion: Russia’s Centre-Periphery Relations from Yeltsin to Putin”, *Demokratizatsiya*, 2001, Vol.9, No.2, p.193; Белякова Анастасия Михайловна. К вопросу о некоторых проблемах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федерализма// Пробелы в российском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стве. 2013. №.5. С.43-48.

② 程雪阳：“联邦制应否基于民族政治自治——从俄罗斯联邦制与民族主义的关系谈起”，《清华法治论衡》，2009 年第 2 期，第 376 页。

③ 邱显平，“变迁中的俄罗斯联邦体制与民族问题”，《俄罗斯研究》，2005 年第 3 期，第 23 页。

④ 侯艾君：“‘鞑靼模式’和‘车臣道路’的比较”，《世界民族》，2004 年第 6 期，第 28-29 页。

⑤ 程雪阳：“联邦制应否基于民族政治自治——从俄罗斯联邦制与民族主义的关系谈起”，第 337 页。

造“民族-地域”一致性。^①为争夺权力资源的“竞价博弈”（bidding game）成为联邦主体与中央政治互动的核心内容。一些联邦主体相对于其他主体来说还获得了不对称的优势，从而加剧了“权力争夺”的无政府状态，严重影响了俄罗斯的现代国家建设。此外，这种模式的另一风险在于，联邦将失去对族自治体的控制，条约联盟无法构建具备国家能力的民族-国家，引发社会混乱和民族-国家认同危机。“在激进社会改革和社会时常陷于不稳定状态的背景下，社会群体丧失了界限和价值观。”^②有证据显示，自实施不对称联邦制以来，俄罗斯国家认同逐步下降，而支持以分离为手段获取更多联邦津贴的自治体的人数在上升。^③俄罗斯国家认同危机加速了俄罗斯人信仰和象征的破坏，引起恶性循环，影响新的国家认同观的形成。^④

通过联邦分权完成脆弱的国家转型，是叶利钦建立民族-国家的一种尝试。原本处于脆弱国家状态的俄罗斯，通过与各联邦主体签订条约，构建了“条约联邦体系”。这是典型的去中心化的民族国家策略，旨在维持领土统一和民族团结。1994年，叶利钦在与各联邦主体领导人谈话时多次强调，要“建立一个完整统一强大的俄罗斯联邦”，表示要加强联邦中央政府对各联邦主体的行政控制权。^⑤但车臣并不听命于中央。车臣分离主义的兴起，导致叶利钦的去中心化政略无法达到最大效果，甚而带来了分离的风险。叶利钦扶持的反对派并没有在车臣站稳脚跟，希求和平解决问题的努力失败了。通过暴力手段解决车臣分离危机则符合前线国家的行为逻辑。尽管分权化在不断加强，但联邦主体还是不惜使用武力来解决分离危机。

① Nicholas J. Lynn and Alexei V. Novikov, “Refederalizing Russia: Debates on the Idea of Federalism in Russia”, *Publius*, 1997, Vol.27, No.2, pp.190-192.

② Андреева Г. М., Психология социального сознания, М. 2001, стр.187.

③ 参见袁新华：“转型以来俄罗斯联邦的民族问题”，《世界民族》，2004年第5期，第12-13页。

④ Зубкова Е. Возвращение к «русской идее»: кризис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и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история / Е.Зубкова, А.Куприянов//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истории в Советском и постсоветск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ах. М., 1999. С.300.

⑤ 张建华：“车臣事变对俄罗斯联邦完整和叶利钦政治命运的影响”，《东欧中亚研究》，1995年第3期，第53页。

（三）第一次车臣战争爆发（1994-1996 年）

1994 年夏天，俄罗斯杜马选举和总统大选已经临近，但叶利钦的支持率却一再下降。为了挽救政治颓势，以叶利钦为代表的强力集团希望通过军事行动解决车臣问题，以树立俄罗斯联邦的统一者的形象。对强力集团而言，一场“小而胜利”的战争实属必要，这不仅可以团结鹰派的力量，也可以最大限度地削弱叶利钦总统圈子里自由主义的影响力。^①在已宣布独立的三年里，车臣分离势力已成功军事化，贫困和高失业率使年轻人将加入分离叛军视为解决生存问题的重要途径。车臣分离武装的迅猛发展对北高加索安全局势构成严重威胁。出于对分权之后强硬分离势力引起的示范效应的恐惧，叶利钦决定发动一场战争解决车臣分离问题。

1994 年底，叶利钦宣布出兵车臣，期望这次“小而胜利”的战役彻底解决车臣分离问题。历经十月事件之后的俄罗斯政权并不稳固，处于前线国家状态的俄国家精英也迫切需要一场战争来增强总统制的合法性，而杜达耶夫也希望与俄罗斯对抗以铲平车臣和平势力。^②很快，俄军就占领车臣首府格罗兹尼。但很快，这次冲突变成了“血腥、漫长及不受欢迎”的战争，旷日持久长达 2 年。车臣战争给车臣带来巨大的灾难，战争造成俄军 4000 多人死亡，多座城市被毁，25000 名平民丧生。^③以部族为核心的车臣人展开对俄军的“血亲复仇”，袭扰俄军和支持联邦政府的车臣平民。车臣分离武装发动民众组织游击队负隅顽抗，并发动恐怖袭击。尽管车臣多次被占领，但剧烈的暴力冲突导致分离行动发展为残酷的族群斗争，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被极化为俄罗斯人与车臣人的血腥对抗。

双方领袖不顾及选民的反对强行对抗造成双输的结果：俄罗斯未能取得“统一”战争的胜利，被迫签署停战协议；车臣因为全面对抗陷入困境，经济和社会凋敝，强化了族际矛盾。车臣分离势力借助伊斯兰极端势力进行抗争，大多数车臣分离主义者将他们反抗俄罗斯视为全球圣战的一部分。而车

① Christoph Zurcher, *The Post-Soviet Wars: Rebellion, Ethnic Conflict and Nationhood in the Caucasu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7, p.81.

② John Russell, *Chechnya-Russia's "War on Terro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70.

③ Ibid, p.83.

臣分离精英将伊斯兰圣战意识作为控制信教的年轻自杀式袭击者的工具。^①战争期间，车臣穆斯林神权领袖副穆夫提卡德罗夫（Akhmed-hadji Kadyrov）宣布对俄罗斯发动圣战，伊斯兰极端意识形态由此弥漫起来。^②这使得车臣分离对抗难以赢得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战争带来的极化的族群矛盾，使国际社会也对车臣分离叛乱感到担忧，这使得车臣分离问题的国际化受到阻滞。再加上俄罗斯积极的舆论宣传和俄罗斯民众的团结和坚定性，俄罗斯境内分离问题很难被西方力量干预。

战争之后，车臣获得了准独立地位，尽管随后车臣领导层相互倾轧阻碍了车臣战后重建和分离对抗，但俄罗斯在车臣战争中的糟糕表现反映了俄罗斯国力的衰微。车臣危机是俄罗斯社会动荡不安的表现，也反映了俄罗斯国家建设的艰难路径。尽管俄罗斯总统制的基本框架已经确立，但不对称的联邦制衍生的国家弱势和车臣战败带来的声誉下降，阻碍着俄罗斯向着现代民族-国家前进。^③自车臣战争之后，叶利钦威望下降，难以建立有效的政治组织来处理派系内部的纷争矛盾，国家生活充斥着激烈的权力对抗。^④民众对政治参与的冷漠、普遍的反战厌战情绪、对“民主派”精英的失望，使得政权巩固缺乏合理性。^⑤经济危机和社会大分化影响着叶利钦总统晚期的民族国家政策。

第一次车臣战争俄罗斯并没有取得优势。由于国力的颓势和军心不振，叶利钦并没有坚持打击车臣分离势力。1996年杜达耶夫被炸身亡，俄罗斯很快与车臣达成妥协，双方签署了《哈萨维尤尔特协议》（Хасавюртовские соглашения），规定将车臣地位问题搁置5年，结束车臣战争。^⑥很快，俄军从车臣撤出，第一次车臣战争结束。

① [美]伊·马克金娜：“民族解放害死恐怖主义——当代车臣恐怖主义问题研究”，黄登学译，第83页。

② Andrew Foxall, *Ethnic Relations in Post-Soviet Russia: Russians and Non-Russians in the North Caucasus*, p.39.

③ 侯艾君：《车臣始末》，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202-206页。

④ Тумаков Д.В. Первая чеченская война 1994-1996 гг. в оценк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левых радикалов// Символ наук. 2016. №.6. С.51-54.

⑤ 李雅君：“车臣问题——普京执政的契机与挑战”，《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5年第4期，第13页。

⑥ 龙晔生：“困扰俄罗斯联邦的车臣问题”，《民族论坛》，2009年第2期，第34页。

四、俄罗斯新型民族-国家政策的形成

构建民族-国家并不是叶利钦任期的核心任务。在叶利钦时代，推进经济改革、确立总统制并维系稳定、维护国家统一是其核心目标。但当时俄罗斯国家精英并不知道如何协调少数民族权利与个人权利，也难以分辨公民（civic）认同和族群（ethnic）认同的区别。^①对他们而言，赢得选举意味着在民主游戏中赢得一切。这使得俄国家精英无暇顾及车臣分离问题，其大部分精力耗费在总统大选和议会选举上。

（一）车臣分离问题“去国际化”

而在车臣地区，第一次车臣战争的结束给了分离势力以喘息的机会。车臣地位未定，使得分离势力得以继续壮大。1997年1月，车臣举行议会和总统大选，车臣分离精英领袖马斯哈多夫（Аслан Машхадов）当选车臣总统。车臣政权也频频向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援助团示好。但很快车臣分离精英就失去了耐心。车臣精英强烈批评欧安组织维护俄罗斯联邦领土主权完整的态度与行动，指责欧安组织对俄罗斯侵犯人权的行为不予关注，并迫切要求欧安组织承认车臣分离问题属于“国际问题”。^②1997年，在欧安组织观察团团团长葛迪曼（Tim Guldiman）表示车臣仍是俄罗斯的一部分之后，欧安组织被勒令离开车臣。车臣分离精英迫切要求国际社会承认车臣的独立，且不愿意与国际组织进行耐心的商谈，这使得车臣分离主义难以赢得国际社会的同情，其分离的合理性也受到质疑。

令车臣分离势力丧失国内外同情和支持的原因，还有其不断制造恐怖事件的战术策略。车臣精英希望通过政治伊斯兰化为其分离事业争取外部支持，为此不惜代价在俄罗斯制造多起恐怖事件。继多次人质危机之后，车臣叛乱武装还在俄罗斯境内各城市公共交通上安置炸弹，造成多人伤亡。车臣

① Ken Jowitt, *New World Disorder: The Leninist Extinc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p.319-326.

② Maria Raquel Freire, “Matching Words With Actions: Russia, Chechnya and the OSCE---A Relationship Embedded in Ambiguity”, UNISCI Discussion Papers, 2005 October, No.9, p.162, <https://www.ucm.es/data/cont/media/www/pag-72532/UNISCI9Freire.pdf>

新建立起来的政权无法控制各路叛军，更难以将其制度化。马斯哈多夫上台之后，就发现自己身处与反对派争权夺利的藩篱之中。政治伊斯兰化的叛军强烈抵制世俗政权，反对车臣新政府。正是这种无法控制的政治伊斯兰力量消解了车臣分离对抗的合法性，并使其染上了恐怖组织的气息。1998年，最高伊斯兰法庭在车臣建立，该法庭将所有的法律置于伊斯兰教法的解释之下。同期，国家舒拉（Шура）成立，这使得分离叛军领袖得以共享权力，极大地削弱了制度化的总统和议会权力。^①1999年，车臣叛军头目巴萨耶夫率领400多人推翻了达吉斯坦共和国地方政府，准备建立一个独立的伊斯兰国家。这极大地激怒了俄罗斯联邦政府。车臣分离势力制造了地区混乱，给国际社会带来强烈的不安全感，这也阻碍了其分离问题国际化的进程。

车臣危机的急剧恶化，使得分离问题成为俄罗斯民族国家建设无法回避的问题。车臣分离主义已经成为极端伊斯兰主义、恐怖主义以及民族仇视的温床。^②车臣地区吸引了各国宗教极端分子。瓦哈比派教徒、阿富汗塔利班组织成员等纷纷进入车臣，谋求驱逐俄罗斯人并在北高加索建立统一的伊斯兰政权。这些外国极端分子将车臣视为培育和发展恐怖主义网络的重要据点、连接中亚和中东宗教极端势力的桥梁。^③车臣分离问题日益复杂化，解决车臣分离问题成为当时俄罗斯民族国家构建的重要任务。

（二）强力解决分离问题——第二次车臣战争

叶利钦下台之时，俄罗斯国家已处于极度虚弱状态。1998年，俄全国89个联邦主体仅有13个向联邦中央缴纳赋税，高加索地区伊斯兰极端势力渗透严重，车臣分离势力也得到国际恐怖势力甚至海湾国家的支持。^④车臣分离势力趁俄罗斯国家虚弱之机，利用宗教激进主义作为宣传手段，呼吁高

① Christoph Zurcher, *The Post-Soviet Wars: Rebellion, Ethnic Conflict and Nationhood in the Caucasus*, p.87.

② Лобанов Владимир Борисович. Северный Кавказ в XX-XXI вв.: система управления в начале прошлого века и сегодня// Вестник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Серия 2. История, 2011. Вып.4. С.137-138.

③ 丁佩华：“车臣民族问题论析”，《世界民族》，2002年第6期，第34页。

④ 蒋莉：“第二次车臣危机的背景、影响及发展趋势”，《世界民族》，2000年第2期，第40-41页。

加索山民联合起来建立北高加索苏丹国（North Caucasus Imamate）。在俄国媒体中，瓦哈比派（the Wahhabites）堪比威胁西方的本·拉登（Osama bin Laden）。1999年9月，莫斯科、布伊纳克斯克市（Buynaksk）和伏尔加顿斯克（Volgodonsk）分别遭受恐怖主义炸弹式袭击。俄罗斯官方宣布这些有组织的恐怖袭击是车臣分裂武装运作的结果，《消息报》宣称这是车臣分离主义者的“群狼”式袭击。^①不管如何，恐怖袭击已经完全改变了俄罗斯民众对车臣问题态度。

车臣分离危机持续发酵，给刚刚执掌国家权力的普京带来完全不同的环境。车臣与俄罗斯联邦和平协议不再维系，车臣分离势力不仅给俄罗斯境内带来巨大的不安全感，同时还威胁到俄罗斯周边的安全。受极端宗教势力支持的车臣分离武装与俄罗斯联邦对抗，以加速政治伊斯兰化进程。恐怖主义在莫斯科制造爆炸事件，造成多幢民房倒塌、223名平民死亡。随后，极端分子又在伏尔加顿斯克（Volgodonsk）再次制造炸弹袭击，造成16名平民丧生。车臣极端分子频繁制造的恐怖袭击引起俄罗斯全民的愤慨，民众谴责叛军针对平民的恐怖行为。但车臣极端分子拒绝承担责任。这种不计后果的恐怖行动不仅令车臣分离武装与极端宗教势力结合，而且为俄军反攻提供了极好的机会。^②

很快，车臣分裂武装侵入临近的达吉斯坦共和国。1999年10月，俄罗斯联邦政府出动空中和地面军队进击车臣。俄罗斯联邦投入10万大军，歼灭大批车臣叛乱武装人员，并设置了20多个军事管理区。刚被提升为总理的普京领导俄军不惜代价与车臣武装激战，并迅速占领了车臣首府格罗兹尼。第二次车臣战争与第一次车臣战争有极大的不同。第一次车臣战争可以说是母体与分离主体之间的分离冲突，源于族群矛盾和政治利益。而第二次

① John Russell, "Terrorists, Bandits, Spooks and Thieves: Russian Demonization of the Chechen before and since 9/11", *Third World Quarterly*, 2005, Vol.26, No.1, p.106.也有观点认为，说车臣分离势力通过恐怖主义手段赢得独立的观点是错误的，甚至认为是俄罗斯联邦安全局（FSB）自导自演爆炸的发生，以谋求发动第二次车臣战争。参见[美]伊·马克金娜：“解放害死恐怖主义——当代车臣恐怖主义问题研究”，《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黄登学译，2005年第1期，第82-96页；Yuri Felshtinsky and Alexander Litvinko, *Blowing Up Russia: the Secret Plot to Bring Back KGB*, New York: Gibson Square, 2007.

② Ханбабаев К.М. Экстремизм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Чечне// Исламоведение. 2010. №.3. С. 104-119.

车臣战争更具反恐色彩，统一车臣的行动不仅显示母体统一国家的意志，也反映了联邦政府对恐怖事件的零容忍态度。第二次车臣战争中，俄军采取灵活策略，不再依赖重武器和火炮，而是通过对车臣聚落的占领，不仅歼灭了车臣叛军有生力量，而且逼迫极端势力离开北高加索地区。联邦政府积极利用社会舆论，将母体针对车臣的战争定性为一场国家战争，是维护俄罗斯联邦和平的正义行为。正因为如此，俄罗斯母体取得了第二次车臣战争的完全胜利，而从事分离活动的车臣叛军由于与恐怖势力纠缠不清，再也不能够夺取政权，也得不到大多数车臣民众的支持。车臣分离运动至此告一段落。

第二次车臣战争给地方带来极大震撼。地方领袖担忧普京上台对地方采取铁腕政策，收回权力，因此转而支持莫斯科市长卢日科夫（Yuri Luzhkov）竞选总统。但经历了十年以自由和民主之名带来的无政府状态，俄罗斯民众更倾向于建立强大的国家，赢得民心的普京最终取胜。^①强化垂直权力（verbal power）和重建联邦秩序成为普京第一任期的核心要务。2001年普京上台之后发布一揽子政策：（1）重建车臣地区行政部门，给予分离势力毫不留情的武力打击，并不允许任何妥协；（2）按照地域设置联邦区，任命总统特别代表^②，加强总统对联邦主体的管理和监督；（3）对联邦主体领导机关和联邦委员会组成原则进行详细规定，确保权力使用制度化，理顺权力关系；（4）废除不符合联邦宪法的地方性法律，建立统一的法律空间。^③随着政令的执行，车臣重建迅速推进。2001-2002年，大多数联邦条约失去法律效力。2003年，将联邦主体权力机关与联邦主体执行机关的权限划分开来的法律开始实施。2004年，卡西亚诺夫政府由于一再拖延最高当局机构改革进程被联邦政府命令辞职。^④

① Alexander Lukin, "Putin's Regime: Restoration or Revolution?", *Problems of Post-Communist*, 2001, Vol.48, No.4, p.39.

② 总统特别代表多由普京从强力集团（克格勃/内务部和军方）中挑选的官员，对普京绝对忠诚。详细参见 Brian Taylor, *State Building in Putin's Russia: Policing and Coercion after Communis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120-121.

③ Lena Jonson, "Putin and Chechnya: Is This How to Square a Circle?", *The Brown Journal of World Affairs*, 2001, Vol.28, No.1, pp.31-33; 庞大鹏：“普京对俄罗斯联邦制度的改革”，《和平与发展》，2008年第4期，第51-52页。

④ 刘向文：“谈俄罗斯联邦现任政府的机构改革”，《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05年第6期，第1-3页。

与叶利钦不同，普京上任之初就采取集权措施，将地方权力逐步收归联邦中央。第二次车臣战争的胜利和集权改革的顺利进行，为俄罗斯的国家能力提升奠定了厚实的基础。^①普京构建国家垂直体系，建立集中化、向心化的联邦制，坚决打击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巩固政局。^②这种民族国家政策契合了俄罗斯国家性脆弱的特点，巩固了俄罗斯国家政权的稳定，为塑造强大的俄罗斯奠定了基础。2005年普京总统发表国情咨文，强调“俄罗斯是根据人民意志选择民主道路的国家；俄罗斯面临两大任务：（1）构建法治有效的现代化官僚体系，保证公共服务的质量；（2）在当前的国境内建成有效的国家制度，确保联邦主体服从中央的安排”。^③普京构建强力国家的民族国家政策一时被解读为“主权民主”——在捍卫主权的前提下建设有俄罗斯特色的民主。^④但“主权民主”理论并未解释清楚普京对民族国家的准确理解：（1）从苏联时代进入俄罗斯联邦治理框架，主权是凝聚国家的必需选择；（2）俄地方和民众需要民主，但实施西式民主反而造就弱势主权，生成脆弱的联邦中央和联邦实体的关系，与俄罗斯强力国家构建相违背。^⑤因此，俄罗斯的民族国家制度构建并不是混搭“主权”与“民主”，而是在联邦中央的强力基础上进行民主制度构建，从整体上维护国家利益。普京将强力国家首先视为建设一个更为有效的内外安全体系：不仅能够抵御颜色革命的冲击，同时能有效预防和应对诸如伊斯兰极端势力和车臣分裂势力演变的恐怖主义的侵袭。

① Халамханов К. Х. Федерализм и вызовы этнократии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Теория и практика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2012. №1. С.41-45.

② 潘德礼：“解析普京的联邦制改革”，《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05年第3期，第14-16页。

③ Putin, “Annual Address to the Federal Assembly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pril 25, 2005, <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transcripts/22931>

④ John Anderson, “Religion, state and ‘sovereign democracy’ in Putin’s Russia”, *Journal of Religious and Political Practice*, 2016, Vol.2, No.2, pp.250-251; 国内学术界对主权民主讨论更为充分，参见张树华：“俄罗斯的主权民主论”，《政治学研究》，2006年第4期，第26-31页；庞大鹏：“俄罗斯的‘主权民主’思想”，《欧洲研究》，2008年第4期，第89-103页；杨洁：“普京的大国理念——主权民主”，《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1年第6期，第9-17页；孙凌齐：“普京政治体制的特征：‘可控民主’——‘主权民主’”，《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6年第1期，第110-114页；范建中、徐宜鹏：“俄罗斯的‘主权民主’由来、争议及前景”，《俄罗斯研究》，2007年第4期，第5-11页。

⑤ 感谢冯绍雷教授就普京对“主权民主论”的看法提供的观点分享。

五、为什么没有分离冲突 ——达吉斯坦案例的分析

第一次车臣战争拉开了俄罗斯联邦中央与联邦单元争夺控制权的序幕。车臣作为俄罗斯联邦内最为激进的分离实体，不计后果地从事分离活动，其代价也是巨大的。与车臣不同，鞑靼斯坦属于俄罗斯的“加泰罗尼亚”（Catalonia），存在着强烈的分离倾向。但事实上，鞑靼斯坦很难出演类似车臣般“政治分离剧目”。这其中有着地缘的原因，鞑靼斯坦如果走向激进的分离状态，从反事实推理来分析，其被俄罗斯各联邦主体单元环伺，使其难以获得外界的持续有力的帮助和支持。另外，鞑靼斯坦对分离的认知与车臣也不相同。车臣将分离视为国家独立所必需的手段，不惧与中央发生暴力对抗。而鞑靼斯坦则视之为与联邦中央讨价还价的筹码，目标达成则放弃分离诉求。正是这种认知和行动的差距，导致了两者与联邦中央博弈的结果大不相同。鞑靼斯坦最终走向自治，并没有与联邦中央发生暴力对抗。

相比车臣与鞑靼斯坦，达吉斯坦属于另一种分离抗争的类型。根据捷潘诺夫（Valery Stepanov）的统计数据，直到1999年，达吉斯坦依然存在着严重的分离威胁，成为仅次于车臣与鞑靼斯坦的潜在分离联邦实体。^①尽管如此，达吉斯坦并没有爆发针对联邦中央的分离对抗，多数暴力对抗源于宗教动机的极端运动和恐怖袭击，难以形成气候。^②本节将探讨地缘和人文环境与车臣相似的达吉斯坦没有形成与联邦中央对抗的分离共同体的原因。

（一）达吉斯坦的多元族群特征

在苏联晚期，达吉斯坦属于分离风险高发的地区之一。这个位于高加索东北部多山的地区，东抵里海，西部与车臣和格鲁吉亚接壤，南部与阿塞拜疆相连。达吉斯坦是多民族地区，整个社会结构建立在部族的基础之上。每

① Valery Stepanov, “Ethnic Tensions and Separatism in Russia”,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2000, Vol.26, No.2, p.323.

② Jean-Francois Ratelle and Emil Aslan Souleimanov, “Retaliation in Rebellion: The Missing Link to Explaining Insurgent Violence in Dagestan”, *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 2015, No.1, pp.1-2.

个部族都有共同的祖先、定居区域以及多个家族。部族内部生活遵循严格的家长制，社会系统较为封闭稳定。达吉斯坦是俄罗斯联邦族群和语言差异性极强的地区，约有 30 多个族群和语言群落共 300 多万人生活于此。其中阿瓦尔人（Avars）、阿尔金人（Dargins）、库梅克人（Kumyks）、列兹金人（Lezgins）和拉克人（Laks）成为这里的主导族群。

在苏联时期，北高加索山地上多个不同的族群和语言群体被整合为达吉斯坦自治共和国，强力的政治构建将政治效忠与血亲紧密相联。与周围其他自治共和国不同的是，达吉斯坦自治共和国的政治设计并不与任何族群相联系，没有族群能在达吉斯坦自治共和国取得主体地位。^①各个族群如马赛克般分布在境内各地，并形成一种跨族群认同，积极融入苏联的大家庭中。在苏联时代，达吉斯坦现代化十分明显，医疗、教育、能源供应以及社会保障等得以迅猛发展。与车臣不同的是，达吉斯坦族群异质性特征以及无主体民族的政治结构，使其在发展中并没有形成族群特权，也就无法为分离运动提供动力支持。

苏联解体给车臣和达吉斯坦带来的冲击完全不同。车臣作为苏联时期受到迫害的族群，在苏联晚期积极寻求机会独立，以挣脱体制的牢笼。而对达吉斯坦而言，苏联解体给官员和民众带来的是绝望和挫败感。去苏联化的进程被视为达吉斯坦历史上的噩梦。苏联解体后，达吉斯坦民族主义力量兴起，但难以被整合于单一主导族群之下。一些族群倾向于建立“联邦中的联邦”，而另一些则公开反对俄罗斯，倡导建立独立国家。^②1991 年达吉斯坦官方通过法案，恢复车臣人在达吉斯坦原住地的权利，支持其回迁。这一决定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当地主要族群阿瓦尔人拒绝为车臣人腾挪空间，而另一主要族群拉克人愿意迁往达吉斯坦首府马哈奇卡拉（Makhachkala）北部地区，但遭到当地族群库梅克人的强烈抵制。达吉斯坦族群内冲突的愈演愈烈，影响到分离共同体的认同，更影响分离精英的动员。

除此之外，达吉斯坦内部也面临多种分离情势。在达吉斯坦北部地区，诺盖人（Nogais）迫切希望从达吉斯坦分离出去。在达吉斯坦靠近里海的中

① Robert Bruce Ware, Enver Kisriev, “Political Stability in Dagestan: Ethnic Parity and Religious Polarization”, *Problems of Post-Communist Problems*, 2000, Vol.47, No.2, p.24.

② Valery Stepanov, “Ethnic Tensions and Separatism in Russia”, p.313.

部地区，库梅克人希望脱离达吉斯坦自治，而南部的列兹金人则希望与邻国阿塞拜疆合并。^①达吉斯坦内部复杂的族际矛盾和族群诉求，导致其难以形成稳定统一的共同体。分离的诉求被族群矛盾和各种族群诉求的噪音所掩盖，以至于难以形成分离共同体，达吉斯坦自苏联发展而来的政治结构也难以被民族力量全面破坏。

（二）垂直权力的有效构建

苏联解体后，达吉斯坦政治精英结构并没有发生剧烈变动。苏联时代的统治精英依旧掌控政权，成为重构达吉斯坦政权的核心群体。这些苏式精英“收买”反对派，通过非暴力合作方式实现达吉斯坦的政治过渡。直到1995年，达吉斯坦才抛弃苏联的政治结构，进行制度重建。^②为此，达吉斯坦发展获得中央财政支持，其政府预算80%源自联邦财政转移支付。^③尽管周遭冲突频仍，达吉斯坦却政治结构稳定，按照俄罗斯联邦的框架进行重构。这使其在北高加索的地位逐渐提升，成为俄联邦中央辐射南高加索和中东地区的重要通道。

赢得第二车臣战争的普京于2000年就任联邦总统，立即着手加强对垂直权力的构建，并要求达吉斯坦等联邦主体进行宪法改革，与联邦宪法保持一致。为推动改革，普京设立了7个联邦区，由克里姆林宫任命总统特别代表，监督各联邦主体进行改革。成为南部联邦区一员的达吉斯坦，承认莫斯科的主导地位，进行宪政改革。达吉斯坦宪法议会很快修正了12处与联邦中央宪法矛盾的地方。达吉斯坦放弃了“地方主权”的要求，以换取莫斯科对其权力精英继续掌权的权力结构的支持。很快，达吉斯坦失去了叶利钦时代的“主权”。自2003年起，达吉斯坦官员逐步开启了政权变革的序幕：
（1）达吉斯坦国民议会地位提升；（2）发布2003年版宪法；（3）响应普京的号召，调整地方选举内容。^④这些调整不仅弱化了达吉斯坦精英对地方

① Valery Stepanov, "Ethnic Tensions and Separatism in Russia", p.314.

② Galina M. Yemelianova, "Islam and Nation Building in Tatarstan and Dagestan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Nationalities Papers*, 1999, Vol.27, No.4, p.610.

③ Enver Kisriev, Robert Bruce Ware, "Russian Hegemony in Dagestan", *Post-Soviet Affaris*, 2005, Vol.21, No.1, p.28.

④ Ibid, pp.29-30.

的控制力，也打乱了精英汲取和分配资源的程序和节奏。大规模的制度调整无疑为普京的垂直管理提供了空间，而达吉斯坦精英也因为权力向联邦中央的交托而失去了资源和控制权，致使“任性”的分离行动无从谈起。

（三）伊斯兰极端主义难以壮大

北高加索的分离主义深受极端宗教思想、特别是瓦哈比主义的影响。瓦哈比主义（Wahhabism）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就在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兴起，苏联解体后广泛传播。瓦哈比教徒声称要净化社会，做回纯粹的穆斯林。瓦哈比派将“圣战”（jihad）视为扩张和保卫伊斯兰教之战，而不是苏菲派所理解“灵性征战”。与车臣不同，达吉斯坦伊斯兰教的发展较少倚重外来思想。达吉斯坦是北高加索最古老、最发达的传统伊斯兰宗教和学术中心，自 11 世纪起伊斯兰教就已在這裡生根发展。19 世纪苏菲互助会在达吉斯坦兴起，至今仍具有绝对的影响力。^①车臣分离主义与伊斯兰复兴运动相结合，形成共生关系。独立和复兴成为车臣分离主义的一体两面。而对达吉斯坦而言，瓦哈比主义并不是追求主权的精神力量，吸引达吉斯坦人的是瓦哈比派的抗争价值。瓦哈比主义对社会平等、公正等抽象价值观的追求以及对当局的抗争吸引了许多年轻人，许多青年将瓦哈比派视为解决社会不公正问题的出路。^②因此，达吉斯坦常出现受瓦哈比主义影响的青年人的抗争运动，但受此影响要求脱离俄罗斯联邦的分离斗争却不常见。

苏联解体之后，达吉斯坦清真寺发展迅速，1994 年发展到 5000 余座。清真寺数量的迅猛增长，为极端宗教思想的传播提供了条件。俄罗斯国民经济和国家行政学院 2017 年的报告，显示贫困人口比例最高的四个联邦主体是车臣共和国（57%）、乌德穆尔特共和国（55%）、奥廖尔州（49%）和达吉斯坦共和国（47%）。^③由于达吉斯坦较为贫困，瓦哈比派在农村和落

^① Chen Bram, Moshe Gammer, “Radical Islamism, Traditional Islam and Ethno-Nationalism in the Northern Caucasus”, *Middle Eastern Studies*, 2013, Vol.49, No.2, p.299.

^② Aurélie Campana, Jean-François Ratelle, “A Political Sociology Approach to Diffusion of Conflict from Chechnya to Dagestan and Ingushetia”, *Studies in Conflict & Terrorism*, 2014, Vol.37, p.124.

^③ Чечня и Дагестан возглавили «рейтинг бедности» регионов РФ. 15 февраля 2017. <http://islam-today.ru/novosti/2017/02/15/сечна-и-дагестан-возглавили-рейтинг-бедности-регионов-рф/>

后地区非常有影响力。^①但对于达吉斯坦精英而言，回归伊斯兰传统已成为默认思想和行为准则。伊斯兰元素积极融入到达吉斯坦政治结构中，成为达吉斯坦世俗政权巩固的重要保障。^②

总体而言，传统伊斯兰势力在达吉斯坦依然发挥着稳定器的作用。自冷战后，达吉斯坦就吸收了伊斯兰复兴运动的理性成分，将伊斯兰因素引入政坛，伊斯兰极端势力难以与传统伊斯兰力量抗衡。而缺乏主体民族、部族主导的社会结构，则使得达吉斯坦精英难以成为对抗联邦中央的共同体领袖。

（四）分离冲突的“回旋镖效应”

所谓分离冲突的“回旋镖效应”，指的是一个地区的分离冲突并没有带来外溢效应，反而促使周边地区更为坚定地抵制分离主义，加速原地区分离主义的消弭。车臣分离武装通过制造战争威胁感，引发达吉斯坦和印古什地区的暴力冲突，拓展势力范围。车臣分离势力不断重复在北高加索地区建立“伊斯兰国”的计划，而这一计划有目标地推动恐怖组织两个层面的扩散：人口扩散和组织扩散。在达吉斯坦有5万多车臣人，是不可忽视的可被动员的重要力量。^③另外，车臣分离武装派遣各自成员进入达吉斯坦，组建激进组织，构建互动关系网络，吸引列兹金人、印古什人等参加，成为达吉斯坦内部极不稳定的暴力因子。

由于缺乏自然资源，农业在达吉斯坦占据主导位置。这也使得达吉斯坦政权的维系极度依赖中央补贴。这种特殊的央地关系，使得达吉斯坦难以出现分离叛军。由于财政困难，达吉斯坦的文化并不发达，本土分离思想和分离主义力量难以维系，分离精英也难以在本土产生。^④达吉斯坦甚至无法想

① Elise Giuliano, “Islamic Identity and Political Mobilization in Russia: Chechnya and Dagestan Compared”, *Nationalism and Ethnic Politics*, 2005, Vol.11, No.2, p.206.

② Vladimir Bobrovnikov, “The Islamic Revival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Post-Soviet Dagestan”, *Religion, State & Society*, 1996, Vol.2, No.2/3, pp.233-234.

③ Valery Stepanov, “Ethnic tensions and separatism in Russia”,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2000, Vol.26, No.2, p.310.

④ Jana Sackman Eato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Islamic Republic of Dagestan: Curricular Decentralization, Social Cohesion and Stability”, *Peabody Journal of Education*, 2005, Vol.80, No.1, p.61.

象，没有俄罗斯的联系和支持，共同体生存能否维系。^①因此，达吉斯坦的分离运动没有自主性，需要车臣分离叛军的强力支持，这也耗散了车臣叛军的大量资源。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达吉斯坦对中央的极度依赖又使民众极易容易与联邦中央一起，对抗内在的分离运动。

莫斯科也将达吉斯坦视为北高加索的稳定器。相较于付出巨大代价换取放弃独立的鞑靼斯坦、有分离倾向的印古什共和国、以及多次与联邦中央对抗的车臣叛军，达吉斯坦倾向于与联邦中央保持密切的关系，以忠诚换取联邦政府的财政支持。在这样的态势下，一旦达吉斯坦出现分离倾向，将对北高加索安全构成重大威胁，这是联邦中央无法容忍的底线。而车臣向北高加索其他地区持续不断地输出分离思想和武装人员，一直引起联邦中央的警惕。1999年，车臣叛军攻入达吉斯坦，加剧了北高加索分离问题，触碰到了联邦中央的底线。俄军不惜代价与车臣叛军对抗，不仅要克服车臣的分离问题，同时也表明了坚决惩罚威胁北高加索安全的行为。而这场分离冲突也被视为“回旋镖效应”，欲求扩大分离成果的车臣叛军最终因为此次冲突而导致自我毁灭。^②

六、普京时代俄罗斯民族-国家建设的对外向度

普京实施的民族-国家建设不仅局限于国内政治层面，在对外关系上也要有所作为，强化俄罗斯联邦作为欧亚地区民族国家的领袖地位和价值。事实上，周边国家不仅在地缘安全、资源、市场等实际的层面对大国的安全状态和经济利益发展至关重要^③，而且在民族国家构建上也能为大国提供完美的场域，促成大国塑造其国族，解决内在的民族认同分歧。因此，普京

① Jana Sackman Eato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Islamic Republic of Dagestan: Curricular Decentralization, Social Cohesion and Stability”, p.69.

② Осамаев А.Д. Чеченск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В 1999-2000 гг.: война и политика// Новый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вестник. 2009. No.2. С.1-14.

③ 顾炜的文章对俄罗斯地区周边政策颇具启发性，该文探讨的是周边政治如何影响俄罗斯的民族国家构建。具体参见顾炜：“地区战略与大国崛起时对周边小国的争夺——俄罗斯的经验教训及其对中国的启迪”，《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1期，第43-45页。

的民族-国家建设工程需要一整套的对外战略给予其支持。可以将普京的对外战略分为两个部分：长普京时代（2004-2008年）和新普京时代（2012-至今）。在长普京时代，俄罗斯民族国家建设的对外战略以拓展和扩张为主，以俄罗斯国家荣誉为核心塑造俄罗斯国家的政治地位和软实力。而在新普京时代，俄罗斯的国际政治焦点集中在乌克兰地区，集中表现为合并克里米亚之后形成危机时代的“后克里米亚共识”，促成了俄罗斯国家强制力的进一步加强，获得体制建设的支持“窗口”。下面将分两部分探讨俄罗斯民族国家建设的对外战略。

（一）追求地区领袖荣耀

在俄罗斯学者安德烈·齐甘科夫（Andrei P. Tsygankov）看来，俄罗斯的对外政策应该凸显俄罗斯的价值观，一国的价值观体系在重要性上是居于首位的。^①民族国家塑造出来的“共同价值”，是维系一国对外政策最为核心的东西。对俄罗斯而言，重新获得在后苏联空间地区的领袖地位，能够极大地激发俄罗斯作为民族国家的荣誉感。而在处理与西方的关系方面，俄罗斯也改变了叶利钦时期“融入西方”的激进政策，采取务实的策略，力图恢复俄罗斯对欧亚地区后帝国时代的“国家”尊严。在普京的第二任期（2004-2008年），俄罗斯开始谋求大国身份，按照国家的意志构建俄罗斯的对外关系。在周边地区爆发颜色革命之后，普京力主推动后苏联空间政治经济一体化，强调俄罗斯对心脏地带的绝对控制，积极推动上合组织发展，并在国际上开始与美国正面交锋。2007年，普京在慕尼黑安全论坛上抨击单极世界的主张，随后俄罗斯外交部发布了《俄罗斯外交概述》，宣称“单极世界的神话正在破产，建立多极世界的客观和主观条件正在成熟”。^②俄罗斯将多极化视为俄罗斯建设强力国家、维护绝对主权和实现大国雄心的重要保障。2008年俄罗斯干预格鲁吉亚境内南奥塞梯分离主义，从侧面证明了俄罗斯维护国家利益、建设强力国家的决心。

① [俄]安德烈·齐甘科夫，《俄罗斯与西方：从亚历山大一世到普京》，关贵海、戴惟静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3页。

② 赵华胜：“普京外交八年及其评价”，《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2期，第17页。

俄罗斯对格鲁吉亚南奥塞梯分离问题的干预可以看作是俄罗斯与西方在欧亚地域的博弈。正如波波·罗 (Bobo Lo) 所说, 八月战争之后, 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恶化到了比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 (戈尔巴乔夫时期之前) 以来的任何一个时期都要糟糕。^①俄罗斯公开使用武力进入格鲁吉亚, 并对国际社会宣布承认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的“独立地位”, 表明俄国仍掌握着国际政治变更的主动权和话语权, 而西方咄咄逼人的攻势在这次对抗中处于下风, 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更显疲软。俄罗斯在八月战争中的胜利, 更是表明俄罗斯的现代民族国家建设初见成效。以绝对主权和有效国家作为国家建设基石, 渐进地完成联邦制改革, 促成国家权力中心化, 抵制颜色革命和极端民主化思潮, 是俄罗斯民族国家政策成功的经验。第二次车臣战争和俄格冲突, 折射出欧亚国家因循不同国家建设逻辑走出的不同道路。强调国家权力中心化和自主性、建设现代民族国家, 使得俄罗斯能够及时解决分离危机, 实现国家的巩固。

普京的八年任期壮大了俄罗斯的国力, 也使俄罗斯正式走入了强政权国家的行列。俄罗斯国家建设的下一个目标即是构建现代民族-国家。2008 年, 梅德韦杰夫就任俄罗斯联邦总统, 第二天杜马以绝对多数 (392 票) 任命普京为总理。但梅德韦杰夫总统的任期是短暂的, 并没有给俄罗斯带来深刻的变化。2011 年他宣布不再竞选总统, 而是提名普京参加竞选。2012 年, 普京再次赢得选举胜利, 入主克里姆林宫。尽管有中产阶级和公民政治参与诉求的压力, 普京仍罕见地做出了政治变革的承诺, 认为俄罗斯将进入“发展的新阶段”, 结束长达 20 年的“发展的后苏联阶段”。^②普京的政治变革实质上是另一种程度的“保守主义”: 尊重国家传统的历史和价值观, 维持俄罗斯作为多民族国家的稳定, 在此基础上保持对外开放, 促进发展。^③显而易见, 在长普京时代, 俄罗斯追求国家荣誉是成功的。普京所构建的欧亚一体化的场域不仅为俄罗斯民族国家构建的发展稳定了外部环境, 也通过对外干预,

① [澳]波波·罗, “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过去、现在及未来”, 《俄罗斯研究》, 张红译, 2009 年第 4 期, 第 3 页。

② 吴大辉: “新普京时代: 危机症候与治理选择”, 《国际问题研究》, 2012 年第 4 期, 第 104 页。

③ Vladimir Putin, “Meeting of the Valdai International Discussion Club, 2014, October 24, <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46860>

为民族国家建设注入了“强制力”和“荣誉感”。当然，不可否认，这种方式也充满了帝国主义式的嫌疑。难怪在 2008 年“八月炮火”之后，爱沙尼亚总统图玛斯·艾维斯（Toomas Ilves）会认为，这是一种范式的转变，“关于俄罗斯不会参与攻击（aggression）的假设被证无效，我们见到了欧洲安全结构范式的转变”。

（二）构建“后克里米亚共识”

新普京时代与其说是新时代的开端，不如说是上两个任期民族国家政策的延续。2012 年大选，普京再次赢得胜利，就任新一届俄罗斯联邦总统。这次普京将以更长时间的任期来追求俄罗斯的国家尊严和荣誉。但此期间，普京遭遇的挑战也更为复杂与严峻。从就任初期的普京个人威信与政权合法性遭遇危机，到俄罗斯干预乌克兰危机引发西方对俄罗斯的多轮经济制裁，俄罗斯发展的危机性更为明显。

在这一时期，对俄罗斯民族-国家构建最为关键的对外战略，即是发生在 2014 年俄罗斯合并克里米亚的行动。有学者认为，俄罗斯合并克里米亚的行动并不是处心积虑或蓄谋已久的，而主要是根据形势的发展顺势而为的结果。^①合并克里米亚的行动给普京带来巨大的声望，在俄罗斯经济增速下降的同时，普京的支持率不断攀升。俄罗斯民众对国家问题的紧迫感和忧虑悄然从经济下降、社会不公、恐怖主义和政治生活转移到了俄罗斯未来国家发展中可能遇到的危机或战争。^②与此同时，以“俄罗斯保守主义”为主要特征的普京主义进一步发酵，成为俄罗斯独特的国家价值观的一部分。克里米亚危机之后，民众对维护俄罗斯的主权和国家地位的重要性的意识进一步提升，这种强调爱国主义和国家权威的“俄罗斯新思想”，毫无疑问对俄罗斯民族-国家的构建带来好处。合并克里米亚之后俄罗斯国内对普京的尊崇以及爱国主义热情，无疑为普京式的强力国家奠定了基础。这种成型的“普京主义”成为“后克里米亚”时代俄罗斯国家精英的普遍共识，在遭遇西方

① 曾向红：“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的心理动机研究——兼论对中国独联体地区外交的启示”，《当代亚太》，2016 年第 1 期，第 48-49 页。

② 具体参见李莉：“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社会情绪的变化”，《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6 年第 3 期，第 22-44 页。

制裁的前提下无疑为俄罗斯国家认同和体制稳定提供了观念动力。^①普京的民族国家政策维持了国内集权体制的有益成果，在恢复传统的基础上维护了俄罗斯在欧亚的地缘政治地位和国际形象，抵制了西方长期的政治孤立和经济制裁，培育出更为强大的爱国精神以回应威胁。俄罗斯传统价值观造就的危机与困境，反而促成了“普京主义”在国内政治观念系统中的稳定性。支撑“普京主义”的观念上升为一种情感式的政治依恋、对国家和强人的心理支持。这无疑是对“后克里米亚”观念共识注入的强大的情感力量。爱国主义成为熨平“创伤”的一剂良药，也是俄罗斯构建国家认同的基础性动员工具。^②

普京的保守主义可以理解为普京的民族-国家建设的重要战略，其目标是完成以俄罗斯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认同建设，建立以俄罗斯为核心的欧亚文明场域。但继续维持这种民族国家政策将面临多方面的挑战：首先，选民的代际转换、互联网政治的崛起以及新中产阶级的形成，重塑了俄罗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成长的市民社会要求普京与社会达成新的“契约”，要求国家对社会做出更多的让步。^③其次，普京谨慎地从俄罗斯历史构建国家认同，并继续带领俄罗斯转型为现代民族-国家，其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让“普京多数”看到俄罗斯的“彻底转变”，成为在国际上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均具备潜能的一流大国。^④这一希望正日渐渺茫，俄罗斯面临内部危机，还需要时刻回应来自西方的压力。从欧盟北约东扩到俄周边地区的颜色革命，欧美国家在保证自身绝对安全的同时，也在使用各种方法遏制俄罗斯的发展。这不得不令普京重新考虑后苏联空间的一体化，在国际社会采取更为务实的态

① 庞大鹏：“‘普京主义’析论”，《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6年第1期，第24-27页。

② 张昊琦：“宿命与超越——地缘政治之于俄罗斯国家认同的意义”，《俄罗斯研究》，2016年第6期，第47页。

③ 具体参见：[瑞典]S·赫德兰：“普京重返克里姆林宫——是时候忘记俄罗斯现代化了吗”，《俄罗斯研究》，2012年第2期，第143-163页；杨成：“‘普京主义’的社会基础与2012年总统选举之后的俄罗斯政治生态发展趋势”，《俄罗斯研究》，2012年第2期，第166-188页。

④ Jakub M. Godzimirski, “Putin and Post-Soviet Identity: Building Blocks and Buzz Words”, *Problems of Post Communists*, 2008, Vol.55, No.5, pp.23-25.

度，以维护俄罗斯国家利益。^①最后，是普京主义能否有效应对来自国内层面的不确定性威胁。俄罗斯的能源依赖型经济模式导致经济发展严重依赖对外出口，经济发展脆弱性极强；阿拉伯之春引发的伊斯兰极端势力抬头，恐怖主义可能会波及北高加索甚至是俄罗斯腹地；长期的普京执政可能带来政权合法性危机，依靠爱国主义驱动的俄民众政治热情难以长久持续。这些因素无疑将促使普京执行更为彻底的维持现状政策，但这反而不利于俄罗斯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以及经济现代化。

2018年以后的普京政权，不仅继续面临乌克兰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挑战，还需要保持高支持率，以维系政权生存。俄罗斯若要继续追求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必须要借助不利的国际环境，创造危机情势，凝聚国民认同，以危机驱动构建更为有效和权威的现代国家。自乌克兰危机之后，俄罗斯对西方寸步不让，既是基于地缘政治上的考虑，更是普京政权合法性基础——强力国家的要求。普京拒绝西方国家染指乌克兰内部事务，并将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武力介入叙利亚反击伊斯兰国，这一系列强势外交动作体现了俄罗斯对绝对主权的信奉，也是在危机时期大国力量的政治演绎。新冷战时代尚未到来，但与西方的对抗已经再次成为俄罗斯国家发展的普遍共识。^②2015年，俄罗斯介入叙利亚内战，支持叙利亚政权，这不仅意味着保护俄国的盟友，还意味着反对叙利亚反对派塑造经营的“民主化浪潮”和伊斯兰国建构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可以理解为俄罗斯与西方价值观和极端势力的角力。^③通过外交行动也为普京政权在危机时期的稳定提供了基础。普京政权在对外政策上的积极作为向外界传达出这样的信号：无论如何，俄罗斯一直能够维护自身的国家安全。尽管受油价下跌和经济危机打击，俄罗斯国家颓势显现，但俄罗斯在欧亚地区依旧拥有绝对优势，并不惧使用武力维护核心价值观和

① Andrei P. Tsygankov, “Vladimir Putin's Vision of Russia as a Normal Great Power”, 2005, *Post-Soviet Affairs*, Vol.21, No.2, pp.152-153.

② 详见黄登学：“新‘冷战’：臆想抑或是现实？——乌克兰危机背景下的俄美博弈透视”，《东北亚论坛》，2015年第3期，第20-30页；R·萨科瓦：“世界秩序：俄罗斯的视角”，《俄罗斯研究》，刘畅译，2016年第2期，第47-61页。

③ 孙超：“空袭叙利亚：俄罗斯的外交巧棋”，观察者网，2015年10月12日，http://www.guancha.cn/sunchao/2015_10_12_337141.shtml

利益。^①历经两场危机的俄罗斯民众不仅需要从普京政府那里找到信心，而且需要看到俄罗斯在世界政治中显现的大国力量。从国际社会寻找资源和获得声望，以维持普京政权的稳定并转危为机，是当前普京政权的核心理念，也成为普京当前民族—国家建设的核心策略。

七、结论与讨论

本文主要运用民族—国家政策的演变模型剖析了俄罗斯国家精英如何通过政策逐步消弭分离风险，在曲折的道路上建设多民族国家。相较于其他欧亚国家，俄罗斯的民族—国家政策较为理性。俄罗斯政治历经 20 多年的发展，在境内实现了暴力的合法性垄断，建立起超级总统制和向心式的联邦国家，同时逐步开始现代民族—国家的认同构建。叶利钦时代和普京时代分别演绎了俄罗斯在国家建设中所经历的不同阶段。叶利钦所构建是完整国家，在与政治对手博弈中创造出适合俄罗斯发展的政治制度，并使用各种手段竭力防止国家分裂。而俄境内车臣分离主义也必然会走向失败，这主要是因为车臣分离精英尽管执掌政权，但由于没有获得持续稳定的外部支持，且由于国际极端势力的卷入和政治伊斯兰化等原因，造成分离事业缺失合法性，也难以获得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第一次车臣战争俄罗斯之所以失败，与车臣青年武装化、母体准备不足和国力颓势有密切关系。但第二次车臣战争，由于分离势力缺乏外界持续支持、又丧失合法性，因而必然会失败，而普京也在打击分离势力的斗争中获得极大的威信，为日后的合并克里米亚积累了政治资本。相对于车臣分离问题，达吉斯坦并不存在规模性的分离力量。除了 2000 年之后俄联邦中央加强对联邦主体进行垂直型权力管理之外，其内在独特的政治社会模式，以及要求迅速融入俄罗斯的强大的政治精英集团，造成民族集团内部难以形成分离动力、塑造出独特的分离共同体。

在普京时期，俄罗斯彻底解决了分离危机，并实施联邦制改革，将俄罗斯推进到了强力国家阶段，并避免了政治衰败。强力国家的建成，使俄罗斯

^① Andrei Tsygankov, "Vladimir Putin's last stand: the sources of Russia's Ukraine policy", *Post-Soviet Affairs*, 2015, Vol.31, No.4, pp.19-20.

国力大为增强，而分离主义也在此刻逐渐消弭。俄罗斯的国家建设初见成效。而新普京时代将继续这一方向，建设高效能的强大国家，完成多民族国家认同的建设。

与长普京时期不同的是，新普京时期将面临更复杂、更险恶的国际环境，俄罗斯的国家自主性和政策的连贯性、适应性将面临很大的挑战，特别是乌克兰危机和持续的经济危机给俄罗斯带来了巨大冲击。普京强调的权威、传统和秩序的政策理念能否继续下去，以完成俄罗斯的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还是个未知数。俄罗斯人的认同问题依旧困扰当前俄罗斯的对外政策选择。从俄格战争、乌克兰危机及随后俄合并克里米亚可以看出，俄罗斯尚未建成成熟的现代民族-国家，从国家精英到民众都具有较为强烈的领土复兴主义（irredentism）意识。而散布在后苏联空间的庞大的俄罗斯民族，将为这种领土复兴主义提供时机，并可能引起周边国家对俄罗斯的恐惧，形成安全困境。^①俄罗斯民族主义在普京时代的崛起，很可能产生邻近国家的俄罗斯族群民族主义，造成周边国家的分离危机，进而引发俄罗斯与其周边国家关系紧张。^②根据普京的外交风格以及长普京时代政权的合法性建设，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至少在较长一段时间，普京不会改变保守主义政策模式，并利用国际危机，推动现代民族-国家建设。

【Abstract】 Since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Russia has gained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its nation-state construction. It has not only greatly promoted its national capacity, but also solved problems of domestic separation, avoiding national failures and political decay. The elimination of separatism in Russia lies in its leaders' choice in a mature nation-state policy. In the 1990s,

① 具体参见 David D. Latitin, *Identity in Formation: the Russian-Speaking Populations in the Near Abroad*,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308-321.

② Harris Mylonas, *The Politics of Nation-Building, Making Co-Nationals, Refugees, and Minorit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Andreas Wimmer, *Waves of W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Crawford Young, "Nationalizing the Third-World State: Categorical Imperative or Mission Impossible", *Polity*, 1982, Vol.15, No.2, pp.161-181; 科纳使用族群民族主义（Ethnonationalism）来论述反抗国家化民族认同独特的族群群体，参见 Walker Connor, *Ethnonational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Russian elites overcame the risk of state division, established the presidential system and asymmetric federal system, but still faced problems of regional decentralism and Chechen separatism. After two clashes of separatism in Chechnya, President Putin carried out federal reforms, concentrated the power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and constructed Russian modern national identity through great power diplomacy. In the new Putin era, Putin greatly enhanced the national character of Russian regime by intervening in other countries' separation and taking over Crimea. Accordingly, achievements in construction of Russian nation-state are again consolidated. At present, Putin's election foreshadows the continuation of Putinism policy concepts and indicates the never-ending paces of Russian nation-state construction. Meanwhile, a new round of challenges also awaits.

【Key Words】 Russian Nation-state Policy, Russian Federal System, Russian Separatism

【Аннотация】 Со времени распад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Россия добилась значительных успехов в национальном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е, что не только значительно улучшило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потенциал, но и решило проблемы внутреннего разделения, предотвратил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провал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распад. Ликвидация сепаратизма в России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в выборе лидерами зрелой стратеги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политики. В 1990-е годы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элита преодолела риск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разделения, создала президентскую систему и асимметричный федерализм, однако столкнулась с региональным разделением и сепаратизмом в Чечне. После двух сепаратистских конфликтов в Чечне президент Путин провёл федеральные реформы, сосредоточил центральную федеральную власть, посредством дипломатии великой державы была построена современная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России. В новую эпоху Путина вмешательство Путина в вопрос о разделении в других странах и присоединение Крыма значительно усилило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характер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режима и в очередной раз укрепило достижен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России.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выборы Путина указывают на продолжени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деологии Путина, на то, что темпы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не остановятся, но это также указывает на то, что россий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 сталкивается с новым кругом проблем.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Российска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политика, российская федеративная система, сепаратизм в России

(责任编辑 李 恪)